

读书

1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 (仲民)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蒙)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

彭德怀 (斯诺)(董乐山译)

1979

DUSHU

读书

2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8	〔笔谈〕解放“内部书”(雨辰8)——制止“侵吞”(辛山8) ——海关这一关(黄仑10)——借书难(黄克10)	
12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仲 民
14	作家与书评(纽约航讯)	董鼎山
20	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张慈中 于 麟
25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卞 哲
31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子 起
35	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吴学灿
39	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诗的断想	良 化
41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50	《根》	杨静远
57	林肯这个人	邓蜀生
63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吴艾军
67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73	“控诉文学”及其他	林大中
77	书讯	

1979 1

四月出版

81	漫谈鲁迅研究	荒 芜
84	“幽岩”质疑	陈 江
87	鲁迅和章锡琛	振 甫
89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 蒙
93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 青
109	《天平之薨》重译记	楼适夷
112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	梅绍武
113	卡静论辛格(西书随笔)	冯亦代
119	人 类	
123	《论	,
130	彭	,
135	胡	,
143	埃	:
148	一	,
153	文	.
152	编	—
159	一	—

读书

1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 (仲民)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蒙)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

彭德怀 (斯诺)(董乐山译)

1979

DUSHU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

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成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

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

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瞿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解放“内部书”

雨辰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

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

制止“侵

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

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

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逖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吞”

辛 山

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

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海关这一关

黄 仑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

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

借书难

黄 克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

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

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笔者日前去探问，答复是：“好书可以，有问题的不行。”

看来，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

可是，居然又发生过连韩素音女士的友好客观的作品也要被禁的笑话……

我们要请问海关，你们的那套

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

“规定”（如果真有什么成文规定的），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之愚不可及，大概只有连打字机录音机都不准寄进差可媲美。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制定出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公诸于众，俾有所遵循？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从四个现代化出发，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还是以这样为好。

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笔谈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仲
民

如果从头说起，那是七、八年以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候的事了。劳动之余，我想到应该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于多年来干的是出版这一行，还曾做过一个书评刊物的编辑，对书的情况比较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特别是他们在书信中对许多书提出了精辟、深刻的评论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便陆续作了些摘录。离开五七干校以后，积累的这些材料藏在箱底，一放几年。

为什么重提这些旧事呢？

当我翻阅着过去摘抄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连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居然也成了禁忌。同时，也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真象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它反映了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光辉顶点的历程；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

从广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和书评有关。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批判杜林利用《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书所构成的“体系”而写作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

三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于是，《反杜林论》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写的书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有三十余篇，其中包括他们早期为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写的书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者和官方报刊以“沉默”来扼死《资本论》的企图，所写的九篇书评。在《资本论》书评中，恩格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把马克思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在所谓“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中，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引导人们注意它的革命性的结论，并且用各种方式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挑战。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书籍的评论意见，还散见于他们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写作《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钻研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而且作了提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重农学派的魁奈到亚丹·斯密，从李嘉图到马尔萨斯，对他们的著作，都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对于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中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即使是一点一滴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积极地予以肯定，热情地加以推崇。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批评和帮助。只有对于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特别是那种以假冒真的江湖骗子，才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在每一

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精神现象学》、《美学》、《哲学史》等著作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当有些人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抛在一边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恩格斯在1865年写给朗格的一封信里，提到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只有马克思足以胜任来整理出版。他说自己虽然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早在1844年写的一封信里，就指出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两书，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解放作用，说大家都非常兴奋，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是作为自然界的三个伟大

纽约航讯

作家与书评

——《纽约时报》的影响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我有一个友人，近来完成了第三部小说，原定去年十月出版，但当时纽约各报大罢工，停刊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出版商、编辑与作者三方同意，延期出版此书。报纸停刊与出版小说有何关系？事实是关系极大。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以后，如要引起读者注意，至少必须经过两种宣传活动。一是广告介绍，在日报、周刊及专门杂志上登载新书广告。另一是书评，出版商将样书提前分寄与各报、杂志及著名文学批评家，请他们发表书评。但美国每年出版之书，数以千计，一般报章不能每书皆评。即